

“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 ——从《邓小平改变中国》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王 慧

(湖南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大题材”; “第一手”; “高层次”; 史传报告

[中图分类号] I2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5-0106-03

在纪实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叶永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纪实文学创作以来,写下了一千多万铅字、130 余部作品。而在他的这些纪实文学创作中,史传报告文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红色系列:《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及《邓小平改变中国》和黑色系列:《“四人帮”兴衰》、《陈伯达传》等。对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和回忆性文字中多次提到其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结合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特点,认为“大题材”说的是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体现了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则指的是文史结合的兼容性。而文与史的完美兼容——“高层次”,则是以“大题材”与“第一手”为基础的,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及其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

在题材的选择上,叶永烈说自己有三个原则,即“第一,是当代重要的政治人物,通过传主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第二,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三,没有人写

过。”^{①719} 第一点原则,体现了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重大的政治题材内容。叶永烈认为,中国的现代史,风云变幻,波澜起伏,是作家驰骋的广阔天地。而现当代史的重大事件,又和中国共产党休戚相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休戚相关。于是,叶永烈以政治人物为线索,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用一部部作品打通现当代史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以当代意识进行审视、关照或重新评价。120 万字的红色系列:《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串联起了 1921 年至 1949 年的红色历程。1949 年以后的历史,又由《“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衰》,加上《陈伯达传》串联起来。紧随而来的《邓小平改变中国》则第一次多角度、全方位、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从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记述了中国当代历史性的这一大转折,使读者了解到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内涵。

写政治题材并非叶永烈的独创,史传报告文学中,记述政治题材的纪实作家大有人在。叶永烈能够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在于他的题材的首次涉及而具有的独创性,即作家所说的写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题材。“知名度高”表明是众所关注的,“透明度差”则表明读者欲知而未知,而“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些棘手,有些甚至是写作的禁区,属于“敏感人物”。对这些人物

[收稿日期] 2010-06-29

[作者简介] 王慧(1986-)女,江西上饶人,湖南大学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解读和揭示,则打开了历史的真相,揭开了历史的谜团。

为纪念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改变中国》是1998年第一版的《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增补版。在第一版的《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时,市面还没有一个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的长篇。叶永烈的《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在当时得到了党史专家的肯定。十多年后,市面上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层出不穷时,《邓小平改变中国》依然是最吸引读者的作品。在于作品补充了10年来新进展的许多新材料,披露和纠正了大量细节和史实,如拘捕“四人帮”这个消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究竟是谁写的,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些是同类作品所没有的。

“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

纪实文学的创作,真实是第一位的。叶永烈的纪实性史传文学作品,大都写历史,又尤为重视这一点。叶永烈曾非常明确地表示过“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100%的真实”^⑩,认为纪实文学的真实表现在“两确”,即“观点正确,史实准确”^⑪。史传报告文学中,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史的描述,无论是观点还是史实,其真实性都必须依托于“文献”。对“文献”一词叶永烈有更为精确的定义:“所谓‘文献’,是由‘文’与‘献’所组成。‘文’是指档案、图书等文字材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材料’;‘献’指口碑,亦即‘活材料’。”^⑫叶永烈形容自己的纪实文学创作是“七分跑,三分写”^⑬,这个“跑”包括“活材料”——采访有关的当事人和“死材料”——到档案馆查有关档案,到图书馆查有关资料。谈及《邓小平改变中国》时,叶永烈说:“我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采访的当事人。”^⑭为了写作这本书,叶永烈在北京频频出入几处“部长楼”,去了中南海、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也采访过很多次。为了弄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关情况,作家采访了胡福明、孙长江、王强华、马沛文、邢贵思、胡绩伟、姚远方、张德成、季宝仰、杨西光之妻等多位重要当事人,收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被采访者的回忆,以及他们提供给作家的一些有关当时的、事件的过程的书面资料。如当时《光明日报》主管理论部的党委委员马沛文,提供给作家的《光明日报》评论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经过》其他附件,以及当事人当时的一些笔记。这些“七分跑”的工作,使叶永烈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邓小平改变中国》有了扎实的基础。

然而,要再现史实,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叶永烈的“第一手”材料还包括对“活材料”和“死材料”的去伪存真。当事人由于年代久远产生记忆上的错误,采访者的故意回避和护短等都会使第一手材料存在不当之处,这些资料只有同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等相互对照、结合使用,才能使史传报告文学较好地避免差错。有时对于还有一些一时难以辨清的历史细节,叶永烈倾向于摆出几种不同的说法,提供给后人研究评说。例如在关于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被软禁在北京宽街宅,秘密会晤了叶剑英,解决关于“四人帮”的这一历史问题,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联络邓叶见面的王震存在

着不同的回忆,作者则把两个版本都详细地列在书中。叶永烈采取对当事人采访为主,查询档案馆和图书馆资料为两翼的严谨的史著考证方法,不仅使自身的文学创作更接近历史,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也对史传报告文学赋予了不同于政治理性的科学理性。

“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

记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两类,一是中共党史专家写的专著,这类书论述清晰,史实准确,但可读性差,近乎教科书。还有一类是“历史小说”,可读性强,文学色彩浓厚,但虚构成分过多,有的为了迎合大众“解神秘”的强烈欲望,甚至成了对名人和伟人私生活的“探秘”式的表述,把历史人物及事件“野史化”。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作品在坚持严肃认真写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坛的畅销书。其中“秘密”,叶永烈说是因为他的书走的是“中间道路”,“取史学的科学性,取文学的形象性,熔于一炉……我在着手写作时,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同时,注重作品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形象性。”^⑮正是这种文与史的结合,文学性和科学理性的统一,使得叶永烈的史传文学作品达到“既纪实,又审美”的高层次。

同时,叶永烈纪实性的史传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层次”又和作家独创性的题材选择、对史实还原之外还追求对历史细节的了解等密切相关。对独创性的选题,叶永烈曾说:“纪实文学的特点就是贴近时代,贴近社会,因此也就贴近了读者。也正因为这样,我很注意纪实文学的选题。我反复斟酌选题。在我看来,只有首先使我激动的选题,我才能写出使读者激动的作品。”^⑯作家所注重的使自己激动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选题,同时也是读者欲知而未知的历史事件,这使得叶永烈的史传文学作品具有了“可读性”。这种“可读性”还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细节的描写,比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的身世、性格等等,从而使历史变得立体、生动。然而,这些人和事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不能是想象、虚构的,而是历史中原本就有的“真实”,它往往存在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回忆中。于是,这就要求作家对当事人的采访还要抓住细节。叶永烈在采访历史当事人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请他们回忆细节。“细节不仅对于小说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充满细节,才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闻其声。”^⑰在写《红色的起点》时,为逼真的写出陈独秀的性格,在采访曾经担任陈独秀秘书多年的百岁老人郑超麟先生时,叶永烈请他回忆陈独秀的习惯动作、嗜好、衣着、饮食以至写作习惯、讲话习惯等等。《邓小平改变中国》中,对一些能反映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而鲜为人知的细节,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如胡耀邦复出后,在偏僻的北京饭店理发,为方便见来人就坐在门口办公等。叶永烈抓住了这些细节,最后加以提炼,让人们从这些细小环节上了解了一个更真实的胡耀邦。

叶永烈“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史传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则,不仅使他的作品在同类题材上总是处在第一位,还对史传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大题材”对史传文学题

材的突破:“第一手”对材料收集分辨、裁剪上,在史学传记与文学传记创作观念的交融上,以及对“文革”史料的系统整理与披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高层次”将史学的科学理性与文学的形象性有机融合的美学追求等等,为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积累了丰富经验。

注释:①叶永烈.黑红内幕——叶永烈采访手记.作家出版社,1999

②钟 华.叶永烈与他记录的时代[N].科学时报,2008-06-26(1).

③秦维宪.口述历史: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教授访谈录[J].探索与争鸣,2006(10):4-7.

[参考文献]

[1] 任汉中.叶永烈的档案情缘[J].湖北档案,1998(4):

38-39

[2] 舒晋瑜.叶永烈: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N].中华读书报,2005-11-30

[3] 黄 健.叶永烈:党史文学写作背后的故事[J].文史春秋,2008(1):18-21.

[4] 郑连生.叶永烈:与书结缘五十年[J].走向世界,2009(15):42-44

[5] 张 弘.叶永烈:历史的记录者[J].中国职工教育,2008(9):56-57

[6] 钟 华.叶永烈与他记录的时代[N].科学时报,2008-06-26

[7] 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J].湖南社会科学,2009(2):138-144

[8] 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文体品格[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2010(1):116-125.

“Significant - theme”, “High - level”, “First - hand” : Ye Yonglie’ 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istorical Reportage from Deng Xiaoping Changed China

WANG Hu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ignificant - theme”, “High - level”, “First - hand” are Ye Yonglie’ s principles of writing. He mentioned them for several times but didn’t explain the implications. Critics quoted the statement without defining the meanings either. I think the three words accurately summed up Ye Yonglie’ s distinctive features. According to Ye Yonglie’ s Literary creation, I’d like to modify the sequence more reasonably: “Significant - theme”——Originality of political theme; “First - hand”——scientific rationality, reconstructed by the historical facts; “High - level”——compatibility, combined the history and the literature perfectly, and try to take Deng Xiaoping Changed China as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glimpse at the three features of Ye Yonglie’ s historical reportage writ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portage.

Key words “Significant - theme”; “High - level”; “First - hand”